

诗学“活法”说不始于吕本中

——兼论胡宿对西昆体的继承与突破

邓国军 曾 明

内容提要 诗学“活法”说，古今学者都认为是南北宋之交的吕本中（1084—1145）最先提出。本文认为：最先提出“活法”说的是北宋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的后期西昆体诗人胡宿（996—1067）。其云“诗中活法无多子，眼里知音有几人”；同时，胡宿用生动恰当的比喻——“珠走盘”阐释了“活法”说丰富的内涵——将“珠走盘”之“体”与“活法”之“用”圆融无碍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其“活法”说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本文在胡宿对西昆体的继承与突破等方面也作了较深入的探索。最后，本文还探索了胡氏的与其“活法”说精神一脉相承的“平淡、自然、清丽、豪壮”等诗学主张。

关键词 “活法”论 “珠走盘” 吕本中 胡宿

在中国诗论中，“活法”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有人说：“宋代诗论中的许多现象都可以归纳到‘活法’的理论概括之下，而呈现其有机的内在联系。举此一纲，可挈众目，挽住‘活法’，可以洞悉宋诗转变之大势，又可观照宋代诗论中许多说法的共同基质。”^①对于它的起源问题，几乎是古今同声，都以为由两宋之交的吕本中（1084—1145）最先提出，而无任何异议。的确，吕本中在崇宁元年（1102）或二年（1103）^②所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中就说：“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③后又于绍兴三年（1133）作的《夏均父集序》中也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精尽智，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然予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吾友夏均父，贤而有文章，其于诗，盖得所谓规矩备具，而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者。后更多从先生长者游，闻圣人之所以言诗者而得其要妙，所谓无意于文之文，而非有意于文之文也。”^④因此，与吕本中同时的人一般把“活法”说的发明权归于吕本中，如谢薖（？—1116）《读吕居仁诗》即云：“吾宗宣城守，诗压颜鲍辈。其间警拔句，江练与霞绮。居仁相家子，敛退若寒士。学道期日损，哦诗亦能事。

① 张晶《宋代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第87—88页。

② 详参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06—309页。游国恩、龚鹏程等认为《江西诗社宗派图》应作于南宋初年，而黄宝华认为应作于南宋绍兴三年（参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黄宝华《〈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定与〈江西诗派〉总集的刊行》，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今从莫先生之说。

③ 王大鹏等编《中国历代诗话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59页。

④ 上海书店1989年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四部丛刊》初编第213册《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第14—15页。上引文字，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2页）作引自《能改斋漫录》卷一〇，误。

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①而曾几（1084—1166）《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亦云：“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政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如脱兔。”^②其他如曾季狸等人皆认为“活法”出于吕本中。曾季狸云：“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③赵蕃云：“东莱老先生，曾作江西派。平生论活法，到底无窒碍。微言虽可想，恨不床下拜。欲收一日功，要出文字外。”^④又云：“活法端知自结融，可须琢刻见玲珑。涪翁不作东莱死，安得斯文日再中。”^⑤今人钱锺书在论杨万里的“活法”说时云：“‘活法’是江西诗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意思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⑥而郭绍虞、王文生亦云：“（吕本中）提出的‘学诗当识活法’的主张，是宋人诗论中的一个著名论点。”^⑦又说：“活法”是“用司空图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及苏轼所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说法，并非尽出于禅家。又他所谓‘有意于文者之法’，与‘无意于文者之法’，也近于苏轼所谓‘随物赋形而不可知’，本非玄妙之谈”^⑧。罗根泽也是这样，他认为“编《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吕本中（绍兴进士），标举‘活法’与‘悟入’”^⑨。

以上所引诸人所论，表明吕本中“活法”说深入人心之大略情形。“活法”说真的是吕本中首创的吗？

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胡宿（996—1067），“字武平，常州晋陵人，天圣二年进士。历官两浙转运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诰，由翰林学士拜枢密副使，以太子少师致仕。文恭，其谥也。……宿立朝以廉直著，而学问亦极赅博。当时文格未变，尚沿四六骈偶之习，而宿于是体尤工。所为朝廷大制作，典重赡丽，追踪六朝。其五七言律诗，波澜壮阔，声律铿锵，亦可仿佛盛唐遗响”^⑩。其对胡宿文学流派和成就的认定和把握十分准确。胡宿《文恭集》卷五《又和前人》诗云：

作者傍边好见闻，速来就妆作比邻。诗中活法无多子，眼里知音有几人？尔许精奇花灿笔，岂容尘俗海翻银？老夫幸有千机锦，尚欠江头一浣新。^⑪

这是一首论诗诗。其中的“诗中活法无多子，眼里知音有几人”言“诗中活法”比吕本中提出“活法”早几十年。在这两句描写诗坛“见闻”的诗句里，胡宿表现出对当时诗歌创作界和评论界的强烈不满。“尔许”二句，表面上看是在写所谓“尔”即诗题中的“前人”的主张：称赞灿笔如花的“精奇”之作，而不容许“镶金嵌玉”的“尘俗”之诗泛滥诗坛。而实际亦是夫子自道。最后二句，则写对自己诗作

① 《竹友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562页。

② 谢翱、曾几、吕本中都被视为江西诗派中人，特别是曾几曾向吕本中请教诗法，谢、曾二人推崇吕之“活法”具有权威性，后来人们言本中之“活法”之盛，实赖谢、曾推波助澜之力。

③ 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6页。

④ 赵蕃《淳熙稿》卷四《论诗寄硕父五首》之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5册，第64页。

⑤ 赵蕃《淳熙稿》卷一七《琛卿论诗用前韵示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5册，第278页。

⑥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9页。

⑦⑧ 郭绍虞、王文生《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二册，第368页。

⑨ 参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第六编《两宋文学批评史》第七章《江西派的诗文方法·吕本中的活法与悟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⑩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10页。

⑪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650页。

的评价：我在诗坛有幸写出了许多如花似锦的艳丽之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诗作已显得陈旧俗套而需要“浣洗”一新了。此中有自负，更有自责；有肯定，更有否定。正是在对诗作的自责和对诗坛的否定中，胡宿求新求变的“活法”论出炉了^①！胡宿殆已认识到，当日的诗坛和自己的创作都需要以“活法”之水，加以“洗涤”^②。

胡宿提出了“活法”说，其创作实际如何呢？下面再略作探索^③：

胡宿生活在北宋真宗（998—1022）、仁宗（1023—1063）、英宗（1064—1067）三朝。北宋自真宗朝起，诗坛流派迭兴，诗作日富。当时活跃于诗坛者主要有以潘阆（？—1009）、林逋（867—1018）、寇准（961—1023）等为代表的宗法唐末贾岛、姚合的晚唐派以及以杨亿（974—1021）、刘筠（971—1031）、钱惟演（977—1034）、晏殊（991—1055）等为代表的宗法李商隐的西昆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昆酬唱集》云：“其诗宗法李商隐，词既妍华，而不乏兴象，效之者渐失本真，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捋扯之戏。石介至作《怪说》以刺之，而祥符中，遂下诏禁文体浮艳。……其后，欧、梅继作，坡、谷迭起，而杨、刘之派，遂不绝如线。要其取材博赡，练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亦不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固亦未可轻诋。”^④胡宿与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2）兄弟于天圣二年（1024）同为进士，共登诗坛。其时，杨亿已死，钱、刘垂老，但这并不妨碍胡宿、二宋对西昆派后期重要诗人晏殊辈的倾慕。相反，他们为奄奄一息的西昆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被称为后期西昆体诗人^⑤。据欧阳修《胡公墓志铭》云：还在杨亿在世时，“杨文公亿得其诗，题于秘阁，叹曰：‘吾恨未识此人’”^⑥。即视胡宿为“昆体”同人。无怪乎清人王士禛要说：“宋人诗，至欧、梅、苏、黄、王介甫而波澜始大。前此杨、刘、钱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赵清献辈，皆沿西昆体。……然予观宋景文近体，无一字无来历，而对仗精确，非读万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后所及。”^⑦又云：“世人谓宋初学西昆体有杨文公、钱思公、刘子仪，而不知其后更有文忠烈、赵清献（抃）、胡文恭（宿）三家，其工丽妍妙不减前人。”^⑧还云：“宋初诸公竞尚西昆体，世但知杨、刘、钱思公耳，如文忠烈、赵清献诗，最工此体，人多不知。……观李子田（裴）《艺圃集》载胡文恭武平（宿）诗二十八首，亦昆体之工丽者，惜未见其全，聊摘录数联于左：……‘西北浮云连魏阙，东南初日照秦楼。’（《津亭》）……风调与二公（按：指文、赵二人，参上引“文忠烈、赵清献诗，最工此体，人多不知”）可伯仲，起结尤多义山神理。”^⑨而翁方纲亦云：“胡武平（宿）、王君玉（琪）皆堪与晏、宋方驾。大约宋初诸公，多自晚唐出耳。宋元宪（庠）、景文

① 与胡宿作为后期西昆体重要诗人力图改变西昆颓弱诗风相似的是，吕本中是后期江西诗派重要的诗论家，也对后期江西诗风有新变的主张。因此，吕本中有可能受到胡宿的影响而提出他的“活法”说。当然，他们都受到禅宗“活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学界对胡宿的诗歌与诗论关注非常不够，只有陶文鹏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上撰文探讨过，但对胡氏“活法”说却未提及。

② 正如清人冯舒、冯班评杨亿《无题》昆体所云：“西昆毕竟高，又非后人所及，然用事少新意”（冯舒语）、“效玉溪，然有新事而少新意，富丽有余而新艳不足”（冯班语）。二冯之言引自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295页。

③ 陶文鹏在《论胡宿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中分析过胡宿诗歌对西昆体的突破与创新，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可参看。我们从“活法”说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胡氏对西昆体的继承与创新。

④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第1693页。

⑤ 遗憾的是，多种中国文学史中只有少数几种把胡宿定为后期西昆体诗人并加以评述，如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⑥ 上海书店1989年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四部丛刊》初编第149册《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四，第13页。

⑦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3页。

⑧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第211页。

⑨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第213—214页。

(祁)、王君玉,并游晏元献之门,其诗格皆不免杨、刘之遗。”^①又云:“入宋之初,杨文公辈虽主西昆,然亦自有神致,何可尽挑去之?而晏元献、宋元宪、宋景文、胡文恭、王君玉、文潞公,皆继往开来,肇起欧、王、苏、黄盛大之渐,必以不取浓丽,专尚天然为事。”^②王士禛、翁方纲谓胡宿等人为后期西昆体诗人的代表,对宋代诗坛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并非无根之论、过誉之词。早在元、明,就有人作如是观了。由宋入元的方回在《瀛奎律髓》中选胡宿诗三首:《公子》、《飞将》、《过桐庐》。其中,《公子》是仿杨亿、刘筠、钱惟演之同名诗作的。诗云:

北第当衢戟有衣,巾帏鲜媚仆如犀。万钱供箸鸣钟沸,三组垂腰佩玉低。座上赋鹦穷处士,楼前盘马小征西。去天尺五城南路,此去青云别有梯。

此诗首句显系仿钱惟演《公子》首句“莲勺交衢接荻园”。方回评云:“胡武平笔端高爽,似陆农师。”^③陆农师即陆佃(1042—1102),乃陆游祖父,有《陶山集》。又方回《恢大山西山小稿序》云:“别有一派曰昆体,始于李义山,至杨、刘及陆佃绝矣。”^④可见方回是把陆佃和胡宿都当作昆体派诗人看待的。受方评影响,清人冯班亦云:“后四句‘昆体’佳境。”^⑤而不满昆体的纪昀则云:“此效‘昆体’而不成。”^⑥对另一首《飞将》:“曾从嫖姚立战功,胡雏犹畏紫髯翁。雕戈夜统千庐卫,缙骑秋收五柞宫。后殿拜恩金印重,北堂开宴玉壶空。从来敌国威名大,麾下多称黑稍公。”方回评曰:“壮丽。凡诗读上一句,初不知下一句作如何对。必所对胜上句,令人不测乃佳。此篇是也。”^⑦纪昀则云:“句格尚健,别无可取。”^⑧按:此诗写“飞将”持“雕戈”,率“缙骑”,或抵御外侮,屡建奇功,威名远播;或夜卫京城,或扈从“秋收”,大受重用,深沐“皇恩”。于此,一个威武雄壮的飞将军形象便横空而出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此诗勉强可堪方回“壮丽”之评。但此诗似是写汉飞将军李广(见《史记·李将军列传》),然而,李广何曾如此威风八面,汉皇对他又哪有如此浩荡皇恩?因此,这样的描写,就难脱“粉饰太平”之嫌。同时,亦如冯班所评:“‘黑稍公’事未切。”^⑨因为“黑稍公”指于栗磾,事见《魏书》卷三一本传。而“紫髯翁”则指孙权,事见裴松之《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献帝春秋》^⑩,更是比拟不伦,用事牵合失当。“用富贵语”以“粉饰太平”,正是西昆体的重要特征;为用事而用事,也是西昆体之弊端。对《过桐庐》一首,方回等则有确评。诗云:

两岸山花中有溪,山花红白偏高低。灵源忽若乘槎到,仙洞还同采药迷。二月辛夷犹未落,五更鸦白最先啼。茶烟渔火遥堪画,一片人家在水西。

方回评曰:“武平此诗妙甚,八句五十六字无一字不佳,形容桐庐尽矣。起句十四字并尾句,可作《竹枝歌》讴也。”^⑪受方回影响,查慎行评云:“睦州青江景致逼真。”^⑫而连最不满昆体的纪昀也说:“风韵绝人,只三四格调稍复耳。”^⑬平心而论,此诗确如诸人所评。特别是首尾四句,不用典故和奇字,只用常语和口语,以白描手法平实写出自己经过桐庐时所见到的景色,一反昆体之雕涩典丽,显得闲淡流畅,清新自然,有民歌风味。即置之盛唐太白集中,亦可乱真。其“山花红白”一句,还使人想到杜牧写宣州水西寺的诗句:“红白花开山雨中”(《念惜游三首》之三“李白题诗水西寺”)。不过,也正如纪昀所评:“三四格调稍复”。“灵源”难道不是和“仙洞”一样的意思吗?这是为了形成对偶而不惜以一意而在一联之内前后叠出,其后果则是语义重复,事倍功半。从方回所选录的胡宿的这三首看,其中既有昆体手段,也有后来欧阳修之流畅、梅尧臣之平淡、苏舜钦之豪壮。从这个意义来看,翁方

①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2页。

②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第1403页。

③⑤⑥⑦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8页。

④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683页。

⑧⑨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三〇,第1336页。

⑩ 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四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99页。

⑪⑫⑬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三〇,第1405页。

纲谓胡宿等后期西昆体诗人于宋诗的发展有“继往开来”的作用。

胡应麟亦有承方回之说而称誉胡宿诗作之言，其《诗薮》云：“胡武平：‘西北浮云连魏阙，东南初日满秦楼。’上句用‘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语，下句用‘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语，联合成句，词意天然，读之绝不类引用昔人者。而兴象高远，优入盛唐。盖梅句（按：指梅昌言询《送夏子乔招讨西夏》“亚夫金鼓从天落，韩信旌旗背水陈”二句。胡氏《诗薮》谓其“冠裳伟丽，字字天然，此用事第一法门也。惜其语与开元不类”）虽极精严，而犹若有意，此则无迹可寻矣。高氏因《鼓吹》误收（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恭集》云：“金元好问选《唐诗鼓吹》误编入宿诗二十余首，说者遂以为唐末之人，爵里未详。今考好问所录诸诗，大半在《文恭集》内。……好问乃不能考证，舛错至此。”其说本此），列晚唐末，不知咸通后安得此调耳。宿诗尚散见宋诸选。《飞将》、《少年》二律俱工。”^①胡应麟所称誉之诗句见胡宿《津亭》颌联，后王士禛亦录以评之。胡氏从用事角度指出胡宿诗有“兴象高远，优入盛唐”者。这也就是说，胡宿诗在用事上有变西昆体者。胡应麟曾说：“凡用事用语，虽千锤百炼，若黄金在冶，至铸形成体之后，妙夺化工，无复丝毫痕迹，乃为至佳。藉读之少令人疑似，便落第二义，况颞搜隐僻，巧作形模，昆体之所以失也。”^②而胡宿那两句便和昆体不同，它“词意天然”，“无迹可寻”，是“兴象高远，优入盛唐”的佳句。因此，即以用事而论，胡宿诗中也有纠昆体“颞搜隐僻，巧作形模”之处。后来，卢文弨在《胡方平文恭集书后》中亦云：“诗丰缛而不失气骨，置中、盛唐间，诚无多让也。”^③疑即从方回和胡应麟之评而来。胡宿《文恭集》卷二有一首《近郊》诗：“信马斗城外，芳郊秋物多。丹叶惊岁晏，华黍喜时和。野老醉相话，牧童闲自歌。牛羊稍觉晚，一一下层坡。”此诗和北宋最早师法白居易的王禹偁《村行》相较，也更显得“兴象高远”，“词意天然”。特别是后四句，用王维《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及《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等语意，而不使人觉，可谓“妙夺化工”也。

不过，在胡宿集中，有不少“压缩典故”的昆体诗。钱锺书先生认为这种“压缩典故”的修辞是唐人类书《初学记》滋长的习气，更是摹仿李商隐的流弊^④。如《初学记》把魏武帝曹操作过“乌雀南飞”一句诗那件事缩成“魏雀”；李商隐《圣女祠》把楚怀王梦见巫山神女那件事缩成“楚国梦”^⑤；晏殊《赋得秋雨》又把它缩成“楚梦”；胡宿把老子讲过“如登春台”那件事缩成“老台”（《文恭集》卷六《漫成》“不敢将春上老台”）等。据钱先生说，胡宿这种“压缩典故”的昆体流弊，比晏殊更甚。今举数例：如《浮石寺》“数刻尽牛香”（《文恭集》卷三）。《四库全书》原校云：“‘牛香’二字，不经见，《法苑珠林》有云：‘牛头之香生于海岸。’此殆节用之。”再如《送曹生归临江别墅》“丽赋凭乌有，清篇托畔牢”（《文恭集》卷三）。《四库全书》原校云：“‘畔牢’二字，不经见，《汉书·扬雄传》有云：‘书名《畔牢愁》。’此殆节用之。”又如《远思》“空对霜葭惊远别，忍题云叶寄《牢愁》”（《文恭集》卷三）。按：“牢愁”二字，亦和上例“畔牢”出处同。胡宿这种为了对偶声律而“压缩典故”的作法，可以说是受李商隐以骈文手法入诗影响的结果。

总之，在胡宿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就其诗作的风格言，既有僻涩难解、艳丽凝重的一面，也有平

①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3页。

②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第222页。

③ 上海书店1989年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四部丛刊》初编第300册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一三，第56页。

④ 见钱锺书《宋诗选注》，第14页。

⑤ 李商隐还生造了诸如“弘阁”、“董帷”、“曹蝇”、“韩蝶”之类的缩语。“弘阁”、“董帷”见《全唐诗》卷五四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237页）《咏怀寄秘阁旧僚二十六韵》“奋迹登弘阁，摧心对董帷”，“曹蝇”、“韩蝶”见《全唐诗》卷五三九（第6158页）《韩蝶鸡麝鸾凤等成篇》“韩蝶翻罗幕，曹蝇拂绮窗”。

淡简远、清新自然的一面^①；就写作手法言，既有割裂古事、堆砌丽藻的作法，也有直写所见所闻所感的白描手法的运用，呈现出诗风转变时期的复杂性。这殆如翁方纲所说，确实起着一种“继往开来”的作用。而其中，风格的僻涩艳丽，手法上对典事的频繁使用、割裂简缩以及对丽词的过分追求，是“继”昆体之“往”；白描手法的运用和平淡清新的诗风，则是“开来”——预示了新一代诗体的来临。而“活法”的提出，正是胡宿能“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保证。

二

胡宿不仅提出了“活法”说、以“活法”作诗，而且还用内涵丰富的“珠走盘”比喻对其“活法”说进行阐释。

钱锺书先生论吕本中“活法”云：“《艇斋诗话》记吕东莱论诗尝引孙子论兵语：‘始如处女，终如脱兔’。……曾茶山《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有云：‘……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如脱兔。’‘脱兔’正与‘金弹’同归，而‘活法’复与‘圆’一致。‘圆’言其‘体’，譬如‘金弹’；‘活’言其‘用’，譬如‘脱兔’。”^②胡宿论诗也“体”、“用”并言，“圆”、“活”兼用，而且更加恰当，其《谢叔子杨文惠诗》云：

老子诗名久废闲，喜君步骤少陵坛。句敲金玉声名远，韵险车斜心胆寒。倾出囊中和月露，皎如盘底走珠丸。苦藏难没诗家事，会看尘冠早一弹。^③

此诗颈联“倾出囊中和月露，皎如盘底走珠丸”，称赞杨文惠之诗体，如圆月露珠一样清亮润泽、似弹丸走盘一样圆熟响亮。当然，这也当是胡宿对诗歌体式的美学追求。这一主张也是和昆体之“僻涩呕哑”、“滞碍蹇艾”背道而驰、针锋相对的。

以“弹丸”喻诗，起于南齐谢朓。《南史·王筠传》即载沈约引谢朓语：“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尔后，此类语意便屡见不鲜^④。但是，其间论诗者却多单言珠而少有如胡宿这样言“珠走盘”的。考“珠走盘”之喻，最早见唐杜牧论《孙子兵法》。其《注孙子序》云：“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⑤而用以描写音乐，则见于白居易那首有名的《琵琶行》之“大珠小珠落玉盘”。大概是在谢朓“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及杜牧“丸之走盘”、白居易“珠落玉盘”等说的启示下，胡宿提出“珠走盘”用以形容诗歌之美，配合自己提出的“活法”之论。自胡宿之后至北宋灭亡，中无一人以“珠走盘”言诗者（其中张耒《赠李德载》有“晁论峥嵘走珠玉”句，但仍无“盘”字）。至南宋初，才有曾几云：“今晨出数篇，秀色若可餐。清妍梅著雪，圆美珠走盘。”^⑥

胡宿从声、形角度言“珠走盘”论诗与以单言“弹”（丸）或“珠”论诗相较，所显现的内容有全、偏之别，层次亦有高、下之异。“弹”（丸）或“珠”，只言其“圆”虽能“转”，然尚未“转”于“盘”，仅为有色无声之形。胡宿言“珠走盘”就不同了：它“圆”而“转”于“盘”，“明珠”与“玉盘”相叩而发出铿锵悦耳之声。它不仅是有色之形，而且还有动听之声；它亦由静而动，由“死”而“活”，由“活”而“响”，从而声形并茂、形象鲜明。使人如见其形、如视其色、如闻其声——而这正可与诗歌的声韵、形式之美相譬喻。众所周知，诗歌不同于散文之处，就在于诗歌有更高要求的声形之美。

① 参见陶文鹏《论胡宿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

②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8页。

③ 《文恭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650页。

④ 参见钱锺书《谈艺录》，第112—117、432—439页。

⑤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五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四册，第3460—3461页。

⑥ 曾几《茶山集》卷一《赠空上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479页。

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绮”指色，“靡”指声；刘勰云：“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①严羽云：“下字贵响，造语贵圆。”^②陶明浚《诗说杂记》释此云：“以音韵言之，必求其响；以色泽言之，必求其圆。响对于哑而言，圆对于涩而言。”^③李东阳云：“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④以上诸人都认为：“色”“声”二义，缺一不可。如此，则单以“弹”（丸）或“珠”喻诗，尚不足以表达出对诗歌本体特征的完整认识和全面要求。只有“明珠”和“玉盘”相叩，即“明珠走玉盘”之喻，才足以言诗歌本体之美。因此，谢朓“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之说，是有缺陷的，它当改为“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走盘”，才既“有具眼”又“有具耳”。又吕居仁云：“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笔者以为，亦当改为“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走盘”，才是真言活法。“盘”为诗规，即诗歌应具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最基本的特征；“弹”如诗句，它一方面必须行于“盘”中而不能出于“盘”外，即每诗都必合于人们对诗歌的基本要求，而不能超出诗之为诗的界定。如出于“盘”，则不是诗；另一方面“弹”于“盘”中行走的路线、快慢，发出声音的高低、长短、清浊等等，却又变化莫测，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这就是“活法”的真谛！与闻一多先生“戴着镣铐跳舞”之主张相比，胡氏“盘”之喻显得更圆融无碍、将诗歌之为诗歌的规定性浑然无迹地融合到“珠走盘”的比喻中，从而使“珠走盘”之“体”与“活法”之“用”圆融地结合起来，为中国古代诗学增添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后来苏轼所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吕本中所说的“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正是对这种圆融比喻的理论概括。他们的概括抽象有余而生动不足。可以说，胡宿从声、形角度提出的“珠走盘”之说，才是宋人对“活法”说内涵的最佳比喻，才能做到在诗中“状物无遁形，抒情有至乐”（《文恭集》卷一）。

在《文恭集》中，有些诗作确实具有“明珠走玉盘”的特色。如《寄芜湖吴殿丞》（卷四）云：

大花滩外忆琴堂，西北山长水更长。缩地何曾人有术，摩天不及鸟能翔。寒梅弄脸英英态，腊瓮蒸醅满满香。怅望未休还怅望，夜来庭下月如霜。

此诗殆写于江浙任上。作者在地处东南的大花滩外想起远居于西北芜湖琴堂的密友吴殿丞，真想自己有化远为近的缩地之术，像鸟儿一样摩天飞去，和他一起欣赏俊俏似美女之脸一样的寒梅、品味香气四溢的腊酒。但是，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自己缩地无术，摩天少翅，只能在庭院之中，踏着如霜的月色，往友人所在方向的上空“怅望未休还怅望”罢了。诗情深挚，格调清新，用语浅近，全无昆体深涩典丽之弊。尤当称道的是，诗人在首联对句（西北山长水更长）、尾联对句（怅望未休还怅望）及颈联（寒梅弄脸英英态，腊瓮蒸醅满满香），或一词复用（如二“长”、二“怅望”），或对用叠字（如出句之“英英”、对句之“满满”），使诗“流转圆美如弹丸走盘”，回还往复，铿锵宛转。其他如“美哉山与河，河流急于马”（《文恭集》卷一《碧楼》）、“一哀吊罢颓阳暮，江南江北尽是山”（《文恭集》卷四《过李白坟》）、“睡魂顿销清到骨，一成僧味似僧家”（《文恭集》卷六《斋祠小饮资议吴侍郎以真如茶二绝句为寄》之二）、“两岸山花中有溪，山花红白偏高低”（见上引《过桐庐》）等，也都可作“一词复用”的佳例。这些诗句，或上下两句之间互相钩连（如“美哉山与河，河流急于马”、“两岸山花中有溪，山花红白偏高低”），或在一句之内重沓回环（如“西北山长水更长”、“怅望未休还怅望”、“江南江北尽是山”、“一成僧味似僧家”），不仅显现出胡宿所用修辞手法的不拘一格，而且使上下诗句联系紧密，整首诗作流动圆转，有“贯玉联珠”之美。不过，似《寄芜湖吴殿丞》这样具有“明珠走玉盘”风格的语短情长之诗，在《文恭集》中并不多见。但“动人春色不须多”，因为此诗大似一枝“报春花”，有了“东风第一枝”，“满园春色”将离我们不远了。不是吗？在胡宿之后不久，由欧阳修等人倡导的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93页。

②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

③ 转引自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119页。

④ 李东阳《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1371页。

诗文革新运动，便以摧枯拉朽之势，给昆体来了个大扫除，他们在诗歌这个“大盘”之内，任意滚动，更加畅所欲言，变胡宿“以骈文为诗”的成法而“以散文为诗”，直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三

胡宿还有一些变革西昆体的主张，与其“活法”说的精神一脉相承。

针对昆体的“句敲金玉”、“雕绘满眼”而提出诗歌应当平淡、自然、不加雕饰。胡宿在《读僧长吉诗》中盛赞僧长吉“作诗三百篇，平淡犹古乐。于言虽未忘，在理已能觉。天质自然美，亦如和氏璞”（《文恭集》卷一）。这里，胡宿用“古乐”喻“平淡”之诗，以“和氏璞”比具“自然”之美的诗。所谓“古乐”，指《礼记·乐记》中的与“新乐”相对的音乐。它平淡无奇，节奏舒缓，“雅而不悲”，使人昏昏欲睡；而“新乐”则与之相反，它“好滥淫志”，刺激性灵，“悲而不雅”，使人听不知倦^①。胡宿殆有以“好滥淫志”的“新乐”比当代昆体之意。“和氏璞”比“自然美”，见《韩非子》，《解老》云：“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胡宿用此之意甚明。谓像和氏璧那样具有“天质自然美”的诗歌不是雕琢而成的。其对以“镶嵌嵌玉”为能事的昆体功夫的否定之意，不言而喻。后来山谷《赠晁无咎诗》云：“执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与胡宿之意正相反。又《太傅致仕邓国公张公行状》云：“公缀文根道，尤邃于诗，峻整平淡，通有二体。”（《文恭集》卷四〇）亦以“平淡”誉张公之诗。

针对昆体之“浓得化不开”的现象，胡宿提出诗句当“清丽”。《送显忠上人归吴郡》云“禅通少林默，诗得杼山清”（《文恭集》卷二）；《送曹生归临江别墅》云“丽赋凭乌有，清篇托畔牢”（《文恭集》卷三）；《览朱表臣卷》云“井边禁树开龙凤，笔下清才坠乌云”（《文恭集》卷四）；《送吴推官》云“秀极武夷峰，清才气所融”、“大对承三道，清篇滞半通”（《文恭集》卷五）；《郑文肃公墓志铭》云“攻诗出于余力，尤极清丽”（《文恭集》卷三六）；《李公墓志铭》云“诗笔清婉，殊有思致”（《文恭集》卷三七）；《蒋公神道碑》云“有高情，富清藻，尤邃于诗，其间所得，往往清绝”（《文恭集》卷三九）；《太傅致仕邓国公张公行状》云“暇日，后车载客相从，文酒雅题探赋，清篇赍属，野兴所适，或累日忘返”、“酷爱张水部籍诗，尝评之曰‘语虽似近，思致清远，浅于诗者，不足游其藩阇’”（《文恭集》卷四〇）等等。其中，有单言“清”者，亦有合言“清篇”、“清才”、“清丽”、“清婉”、“清远”、“清藻”、“清绝”者。就具体内容而论，它们或言诗才（如清才），或言诗作（如清篇），或言词藻（如清藻），或言诗风（如清丽），或言诗情（如清远），或言声韵（如清婉），或言“清”的程度（如清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充分表现了胡宿对“清”的偏爱。

针对昆体之靡弱，胡宿表现出对豪壮有力的诗作的推崇。《太尉文肃郑公挽词三首》之二云“辞锋横剑戟，诗笔走风雷”（《文恭集》卷二）；《翰林南阳叶公挽词三首》之一云“辞源长万里，笔力重千钧”（《文恭集》卷二）；《集贤石学士出守符离》云“巴郡辞人才藻壮，汉家循吏教条宽”（《文恭集》卷四）；《送次道学士倅洛中》云“一代策书承世学，三川风月属诗豪”（《文恭集》卷四）；《石曼卿学士挽词》云“才出群英表，文推一代雄。灵蛇操掌上，云梦纳胸中。醉墨千峰立，吟毫八极空”（《文恭集》卷五）；《郑文肃公墓志铭》云“才高而兼华实，文雄而有气骨；盖人伦之华袞，而才林之杰藻也”（《文恭集》卷三六）等等是其证。

胡宿的这些主张都是为了矫正西昆体之弊，富有变革精神，与其圆融无碍的“活法”说精神一脉相承。换言之，其“活法”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变革精神”，而这种变革精神正是“宋代诗论中的许多现象都可以归纳到‘活法’的理论概括之下”的一根红线。

^① 参见王发国、熊启靖《曹操文艺思想初探》（下），载《许昌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综上所述,诗学上的“活法”说是胡宿最先提出的。胡宿用生动恰当的比喻——“珠走盘”阐释了“活法”说丰富的内涵——将“珠走盘”之“体”与“活法”之“用”圆融无碍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其“活法”说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尽管胡氏诗歌创作与其理论主张还有一定距离,但其“活法”论的革新价值取向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研究胡宿的“活法”说,不仅是探究“活法”说的发明权的需要,更是对后期西昆体诗人的革新努力进行肯定以及对北宋诗坛进一步进行评价的需要。

[作者简介]

邓国军,四川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发表过专著《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表现”范畴及命题研究》等。

曾明,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发表过专著《古代五大山水诗人论》等。

• 札记 •

“苏洵十八岁首次应试”辨

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云:“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后十余年,昌言举进士及第第四人。”欧阳修《苏洵墓志》亦记载,苏洵“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才异等,不中”。曾枣庄和孔凡礼等先生认为,“未成而废”中的“未成”就是应举失败的意思;进而根据石昌言进士及第时苏洵三十岁,推断苏洵首次应试年龄为十八岁。对这一推断的细节,曾枣庄在《苏洵生平事迹考辨——对关贤柱同志〈苏洵年谱〉有关系年的几点商榷》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设苏洵十八岁即天圣四年(1026)初举进士不中,至石昌言于宝元元年(1038)进士及第为十二年,与‘后十余年,昌言及第’正合。”

“未成”一词归纳起来有三种意思:一指学习某方面知识却未达精通,类似于元人柳贯所说的“学未成而废”(跋齐履谦《春秋诸国统纪》语)。二指著述未完成,如《新唐书·李元纘传》:“初,左庶子吴兢为史官,撰《唐书》及《春秋》,未成,以丧解。”三指学习、著述以外的其他某种事情并未做完,如《新唐书·韦武传》:“护治丰陵,未成,卒。”似未有用“未成”明确表达“举进士未及第”意思的例子。同样,宋人笔下的“学未成”也与举进士是否成功无关。如与苏洵生活年代大致相同的王安石有“某学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俯仰以赴时事之会”(《答王深甫书》其二),又有“某懦弱浅薄,学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于圣人之道……”(《答陈晷书》)等句,其中之“学未成”即“学习某方面知识却未达精通”之意。可作理解苏洵“未成而废”含义的重要参照。另外,苏洵向张方平介绍苏轼兄弟时说:“……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上张侍郎第一书》)当时苏轼兄弟尚未登科,“既成”之“成”与王安石“学未成”之“成”当同义。

苏洵幼时“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如《祭亡妻文》中所言,直到婚后仍然“游荡不学”,惹得程夫人“耿耿不乐”。苏洵娶程氏在天圣五年(1027),已经十九岁,比曾、孔所推断的首次应试时间还要晚一年。又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载,苏洵“已冠,犹不知书”。十八岁的苏洵似不可能去举进士。再则,假如苏洵十八岁时曾进京参加过考试的话,到四十岁落第回乡、绝意科举时,相距已二十二年;而叙述了首次应试行程的《忆山送人》却说:“归来顾妻子,壮抱难留连。遂使十余载,此路常周旋。”“十余载”与“二十二年”,年数并不吻合。

由此可见,“苏洵十八岁首次应试”这一判断有待重新审视。

(沈章明)